

一個基督徒的歷史觀——

巴特費爾德及其《基督教與歷史》

張妙娟

摘要

自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思潮興起後，曾經在中世紀近千年歐洲史學中盛極一時的神意(Providence)史觀即備受質疑與批判，此後歷經十七世紀的科學主義、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理性主義、十九世紀實證史學、以及二十世紀歷史相對主義的衝擊與批判，神意史觀的歷史解釋不再見容於學術界，但基督教與西方史學的關連並未因此斷絕。一部份史家仍努力持守著基督神學中的歷史觀點，並相信除了一般性社會、經濟、政治的解釋因素之外，上帝在歷史變遷中依然有其地位。

本文首先探討基督教思想家對二十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極權政治、經濟大恐慌等災難衝擊的觀點，及其回應西方精神文明重建的相關論戰之背景。其次以英國基督徒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為例，說明其基督信仰與史學訓練的時代淵源，進而分析其《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一書中所呈現的基督徒歷史觀。總而言之，巴特費爾德相信歷史的發展是上帝的計畫與人類的回應之結果，人類在歷史中自有其尊嚴與價值，而災難與悲劇可以激發心靈的省思，有益人類的成長與歷史的進步，反而從惡中創造出善來。

關鍵字：基督教、基督教史學、巴特費爾德、神意史觀。

壹、前言

回顧西方歷史的發展，基督教不只是在宗教上有其主流地位，在型塑西方社會、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史學的發展上都留下深刻的影響。但也因為如此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的存在，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思想學派遭受到更多的討論與更嚴厲的批判。就史學發展而言，從羅馬帝國時期開始，基督徒史家就需要不斷的回應受過希臘哲學訓練的學者們的嘲諷與抨擊，並且試圖以哲學思辯來說明基督信仰的合理性，因而促成了神學(theology)與「護教作品」(Apologetic writings)的出現¹。另一方面，這些作家也回歸歷史來找尋證據證明基督教是歷史發展下的產物，而非某些人為憑空所想像，這些努力形成了日後的基督教史學。

西元五世紀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 354-430)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提出了上帝是歷史主宰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即善與惡)兩大勢力不斷的衝突並且趨向進步的結果。這種認為歷史是直線發展的「神意」(Providence, 或譯為天命)史觀與希臘、羅馬人認為歷史是循環不已，沒有最終目的的循環史觀(Cyclical theory of history)大不相同。隨著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優勢，中古世紀近千年的史學幾乎離不開神意史觀的主流意識。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思潮興起了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解釋觀點，認為應該通過人類現世的活動來瞭解歷史、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而不是用上帝意志來解釋一切²，從而也展開了對「神創造的歷史」(God-made history)的質疑。此後歷經十七世紀的科學主義、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理性主義、十九世紀實證史學、以及二十世紀的歷史相對主義的批判浪潮，神意史觀幾乎無法立足於西方史學界，教會式的歷史解釋也逐漸沒落。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受到各種時代思潮的衝擊與無情批判，神意史觀也日

¹ 王任光，〈西洋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史學〉，收錄於《信仰與史學》，（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頁119-120。

² 賈東海，郭卿友編，《史學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89-390。

趨式微，基督教與西方史學的關連卻沒有因此而斷絕。時至今日，採用絕對神意史觀解釋歷史的或許不再見容於學術界，但有一部份史家仍努力持守著基督神學精義的歷史哲學，相信在一般的社會、經濟的解釋因素之外，上帝在歷史中仍有其地位。這些學者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仍信神意，並直接用以解釋歷史者」³，例如十七世紀的法國的大主教 Bossuet(1627-1704)，十九世紀美國歷史之父 George Bancroft，德國科學派史學之父的蘭克(Ranke)，二十世紀的美國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另一類學者是「仍信神意，並間接影響解釋歷史者」，例如當代英國歷史家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這些學者在世俗的學術專業上都有其傑出且被廣泛認同的研究成果，但在其作品中卻可看出蘊含深刻的基督信仰。

史學、史家與時代是研究過去歷史時所必須密切注意而不可拆分的環節，時代會影響史家的主觀意識和價值感，而史家依其心智研究、解釋歷史，他的史著風格與思想也就反映了時代精神。基督教的歷史觀誠然不是二十世紀史學研究的主流，但經歷十九世紀實證史學的批判與當代相對主義史學的衝擊，基督教的歷史觀仍然能持續其傳統而不墜必定也有其時代意義。本文主要目的是以英國基督徒歷史家巴特費爾德為例，從二十世紀的動亂時局和他本身的基督教信仰來探討巴特費爾德的史學淵源，並且進一步分析《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這本書中所呈現的基督徒歷史家如何看待當今歷史學研究的本質與對歷史上災難的觀點。

貳、動亂時局的衝擊與基督教思想家的回應

(一) 世紀災難的衝擊

二十世紀人類經歷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工業革命以來所建立的科技、文明、進步的社會幾近崩潰。除了戰爭之外，1917 俄國革命帶來的極權政治、德國的納粹政權、資本主義的流弊、經濟大恐慌、越戰等接連而來的世紀災難帶

³ 這兩種分類是轉引自周樸楷，〈基督教與近代西方史學的關係〉，《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八期，各個代表學者的思想在這篇文章中均有摘述，詳見頁 63-82。

給人們更多的痛苦，似乎一切的幸福都可以在人類的利益衝突中毀於一旦。這個英國歷史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稱為「苦難的時代」(time of troubles)⁴連帶也動搖了人們一向對菁英領導的信心與對人性的樂觀⁵。這股重新省察歷史發展的意義與人類未來命運的風氣蔓延到了哲學、神學、歷史、文化各層面的探討，並且自第一次大戰時期延續到 1970 年代。

物質世界的幻滅，使得人們再度重視精神文明的尋求，向來影響西方文明歷史悠久的基督教信仰遂在此時重新成為注目的焦點。英國歷史學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認為：「如果我們的文明要恢復活力、甚至繼續生存，就必須停止對精神的忽視，不要再認為宗教與個人、社會無關，而是社會生活與文化活力的根源」⁶。許多基督教思想家自 1930 年代起也陸續發表著作回應社會的需要，試圖提出紊亂世界中文化重建之道。這當中包括英國天主教歷史學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的《進步與宗教——歷史的探索》(Progress and Religion: An Historical Enquiry, 1929)，英國國教背景的湯恩比出版《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1934-39)，德國路德教派傳統出身的神學家田立克發表《歷史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6)，尼布爾的《信仰與歷史》(Faith and History, 1949)，以及巴特費爾德的《基督教與歷史》都是此時極具代表性的著作。西方世界似乎再度興起一股對基督教歷史觀點感興趣以及期盼基督信仰能重建精神文明的風潮，根據 1973 年的一項統計可以看出這段時期有關基督教歷史觀的討論盛況⁷：

⁴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176.

⁵ C.T.McIntire,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8.

⁶ Dawson, *Enquiries into Religion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Sheed & Ward, 1933) p.28.轉引自 McIntire,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9.

⁷ Robert North 的統計只有針對有關聖經研究與神學的論文，並未包括道森，尼布爾，田立克，湯恩比等人的著作，是其美中不足之處，但仍有參考價值。

表一：1907-1969年有關基督教歷史觀之著作統計表

時 間	英文論著總數(篇)	所有語文論著總數
1907-29	1	18
1930-34	3	37
1935-39	16	37
1940-44	3	16
1945-49	10	41
1950-54	21	76
1955-59	36	103
1960-64	83	225
1965-69	150	291

資料來源：Robert North, "Bibliography of Works in Theology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12, 1973, pp.55-140。轉引自 C.T.McIntire,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23.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作數量銳減之外，此後其他年代都呈現增加趨勢，特別在 1960 年代有關基督教與文化重建的論著有大幅度增加。當西方世界關切歷史與文明發展的危機時，這些基督教思想家所提供的見解只是眾多挽救途徑之一種，他們對歷史發展問題的注意和其他自由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與馬克斯主義者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從基督信仰的傳統角度對人性的看法是許多其他學派所忽略的。

(二) 普世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

當基督教學者積極回應時代變亂的衝擊、致力尋求應對之道時，基督教會內部也鑑於各宗派的組織、教義分歧而力圖統合眾教會，為福音的廣傳貢獻更多的力量。「教會合一」(Ecumenism)原來的意義是普世(The Whole World)，所謂「普世合一運動」包含了三個主要範疇：所有信徒的合一、教義相同的宗派互

相聯合、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合一⁸。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在歷史上很早就有多次爲了整合教義與宣教行動而舉行的合一行動，例如天主教自 325 年的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開始一共舉行了 321 次教會合一會議⁹。基督教方面，歐陸和美洲在十九世紀都有一些聯合組織出現，例如 1846 年的「世界福音聯合會」(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面臨二十世紀的苦難，教會爲了響應、支持、實踐合一的理想，許多的國際會議在各處召開，廣泛討論各宗派的理念，因而促使基督教思想家匯集理論，凝聚力量爲重建文化找尋解決之道，也爲基督信仰重建立足點。一次大戰後的 1910 年有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二次大戰後，從 1948 年成立的「普世教會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所召開的幾次會議主題可以看出他們關切的課題與宗旨，例如 1948 年的主題是「上帝的計畫與人類的紊亂」(God's Design and Man's Disorder)，1954 年的主題是「基督-世界的盼望」(Christ—The Hope of the World)。參與這些活動的除了教會中的人士，也包括了各階層領域的學者、思想家(如湯恩比，道森，巴特費爾德等人)，而且他們也常擔任聯合組織中的重要職務與代言人(如湯恩比就曾經是 Commission of Church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成員)。多數學者的論點有些共同的交集，也有分歧之處。總之，「普世合一運動」爲方興未艾的基督教歷史觀論爭提供了支援的組織系統，使「曾經給予西方文明最原始精神動力」¹⁰的基督信仰得以凝聚成一股勢力。

參、巴特費爾德的史學淵源

史家離不開時代，史學是時代的產物，巴特費爾德奠定基督教史家的聲名也是深受上述世紀災難衝擊背景的影響。但在他進入史學研究領域之前，巴特費爾德早已經具備深厚的基督教信仰。1900 年他出生在英國一個衛理公會

⁸ 司徒焯正，《近代神學七大路線》(香港：證道出版社，1978年)，頁 116-118。

⁹ 同前註，頁 120-123。

¹⁰ 同註 6。

(Methodism)自由派教友的家庭中，敬虔的父親常常在家裏召集查考聖經的聚會，巴特費爾德耳濡目染曾經立志要成為平信徒傳道人(lay preacher)，可見他在基督信仰上的根基與投入。衛理公會的自由派教義強調勤奮、自我教育、獨自做抉擇、仁慈待人等美德。因此在信仰上相當的具有自由精神，在社會思想上就表現出對中下層階級的同情。¹¹ 在日後巴特費爾德的著作中每每流露反映這些從小建立的信仰精神，以下的論述中會再說明。

巴特費爾德的史學訓練開始於就讀劍橋大學的彼得書院(Peterhouse Cambridge)，1924年發表了第一本書《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此後直到1979年逝世共在生前出版了十二本著作，當他去世後又由他人代為編輯出版了兩本與基督信仰有關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探討政治史的包括《拿破崙的和平策略》(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929)，《惠格派的歷史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1)，《馬基維里的治國術》(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 1941)，《英國人及其歷史》(The English man and His History, 1944)，《喬治三世、諾斯爵士及其人民》(George II, the North and the People, 1949)，《基督教、外交與戰爭》(Christianity, Diplomacy and History, 1953)，《喬治三世與史家》(George II and the Historians, 1957)。討論史學發展課題的有《歷史與人類的關係》(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 1951)，《人類話往事》(Man on His Past, 1954)，《近代科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949)，此外就是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1949)，《基督教與歷史論文集》(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1979)，以及《歷史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 1981)¹²。

綜觀這十四本著作，巴特費爾德的主要研究領域大致集中在政治史、史學史與基督教的探討，其實這也反映了二十世紀史學發展的時代特色。十九世紀以來以蘭克為中心的實證派史學所主張的就是「緊握歷史事實」，「堅持歷史

¹¹ C. T. McIntire, "Introduction to Butterfield's 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轉引自周樑楷，〈史學與宗教〉，收錄在《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p.116。

¹² 本文主要探討巴特費爾德的基督教歷史觀，限於篇幅，對於其他著作的要點無法一一討論，有關各書的摘要介紹請參考周樑楷，〈巴特費爾德史學思想之研究〉，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2年，頁65-103，以及〈史學與宗教〉，收錄在《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p.113-125。

研究的完全客觀性」，而重視史料考證、檔案記錄的結果往往是強調政治變遷、戰爭、外交成敗、英雄人物在歷史中的地位，偏重對政治史的研究是實證史學的特色之一。巴特費爾德在劍橋求學時受到 Harold Temperley 的影響，吸收了實證史學與德國觀念論的研究方法¹³，他的著作中有七本是以政治為課題，而且大多以歷史人物為中心(例如拿破崙、馬基維里、喬治三世等)實在是很明顯的印證。

再者，因為對德國史學的接觸，巴特費爾德也關注到十八世紀後半葉開始格丁根大學(Göttingen University)在史學史方面的研究風氣。1760年起教會人士為了護教論戰而從語言學(Philology)著手研究古代教會的種種文獻，奠定了史學研究科學化的基礎。後來加上漢諾威(Hanover)王朝的支援，格丁根大學成為歐洲史學研究的重鎮，在史學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史學批評精神的建立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¹⁴。

在歷史專業訓練上巴特費爾德與德國史學有深厚淵源，相當推崇十九世紀以來的史學運動，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能自覺蘭克實證史學的弊病，並且勇敢加以批判，他與同時代的英國史家那米爾(Sir Lewis Bernstein Namier)的一場學術論戰就是針對過渡科學化研究把歷史帶入機械論的批評¹⁵。巴特費爾德認為單單倚靠檔案、文字史料來重建歷史會將史家侷限在官方的觀點中，如此一來還需要引用其他方面的證據來矯正錯誤，史家的工作將會倍增¹⁶。此外，實證科學的研究還會帶來兩種負面影響，一是懷疑論，二是機械式發展的歷史。其實精確的考證只是表明過去的歷史情節需要重組，並非全盤推翻。古代的歷史研究也運用過考證方法，有些考古學的發掘也證明部份文獻的可信度，因此對那些經過多世紀研究過的學術，我們應該保有相當的尊重¹⁷。何況史家會受到所使用的工具與證據性質的限制，常將歷史變成機械式發展，或是只注意可以度量的證據，結果使學院派歷史變成單調、沒有生命，就像久已習慣把一朵花一

¹³ 周樑楷，〈史學與宗教〉，收錄在《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p.118。

¹⁴ 周樑楷，〈巴特費爾德史學思想之研究〉，頁36-39

¹⁵ 同前註，頁9-11。

¹⁶ 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49) p.13。

¹⁷ *Ibid.*, p.15-16。

瓣一瓣拆開研究其構造，卻忘記看整朵花的美了。¹⁸ 學院派與科學性的研究有其價值，但無法求得對人類戲劇的解釋，我們還需要詩人、先知、哲學家、神學家的共同努力建構，才能求得完整的人類戲劇的解釋。¹⁹

至於巴特費爾德有關基督教的作品其實是他自幼宗教信仰的流露，本文第二節所論述的二十世紀的文明危機與教會的普世合一運動的大時代背景也是激發巴特費爾德深入探究基督教與歷史關連的動力。他相信歷史的變遷中有上帝的存在與干預²⁰，只用科學方法、自然律是無法全盤解釋歷史的發展的，有時單獨一個事件可以解釋歷史變遷的發生，但是有時我們卻無法只用「巧合」來解釋為何同時有許多的事件會接連地發生²¹。歷史家不能像生物學家，他所研究的是人與人相處的世界，需與自然界有分別，在某些特定時空中，人類會形成微妙而精密的組織型態，人在其中會有許多差異性存在²²。因此「歷史家對於歷史事件的處理並不是把它們當作可以機械地或是表面地來處理的事件，而必須當作出自人性以及會影響人性的事情來處理，所以在我們能把這一件事與別件事情連貫起來，或是想對任何事件有所理解之前，……一定要探究到正確的心境與動機、希望與恐懼、情慾與信仰。」²³

對巴特費爾德而言，由於這種對人類與人性的重視觀點，歷史就成為特別的科學，「其特別之處就在於它是這般大量地依靠那些只能用智慧、同情、和想像來發現及證實的東西。」²⁴ 所以史家需要運用他的想像和同情，設身處地來重建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總之，概觀巴特費爾德的學術生涯可以看出他與時代的緊密關連，除了史學專業的訓練之外，基督教的信仰在他史學觀點的型塑過程中佔有關鍵性的影響，而他成為一個二十世紀的基督教歷史家確實充分反映了史學發展的時代脈絡。

¹⁸ Ibid., p.20-22.

¹⁹ Ibid., p.23.

²⁰ Butterfield, "God in History" 收錄於 McIntire,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196.

²¹ Ibid., p.198.

²²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p.5-8.

²³ Ibid., p.26-27.

²⁴ Ibid., p.17.

肆、《基督教與歷史》

巴特費爾德探討基督教對人類歷史影響的最主要一本著作、也是最能明白揭示他基督徒歷史觀的就是 1949 年出版的《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這本書原是在劍橋大學的六次廣播演講稿所編輯成的，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復原期，世界各地的災難、革命、戰爭並未完全止息。當人們思索戰爭悲劇、人類的歷史命運時，巴特費爾德開宗明義的表示這是從基督教的觀點出發來看「基督教如何影響人們對各項歷史事件的態度，……(並且討論)我們應當對環繞在周圍的偉大歷史事件採取怎樣的態度。」²⁵事實上，在這些系列演講之前，巴特費爾德的著作一直是把個人信仰與史學研究加以嚴格區別的，換言之，基督信仰很少出現在他的學術作品中作為對歷史的解釋或研究。但是《基督教與歷史》出版之後廣受注目與肯定，到 1970 年代已有 8 種不同語言的譯本²⁶，巴特費爾德不只是奠定他個人基督徒歷史家的學術地位，也使基督教的歷史觀重新在史學界佔有一席之地。《基督教與歷史》全書除了導論之外，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史學與人生的關係，第二章歷史中的人性，第三章歷史的審判，第四章歷史中的大動亂與殘酷戰爭，第五章神意與歷史的演進，第六章基督教——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宗教，第七章歷史、宗教與今天。對於全書的重點筆者不想逐章介紹摘要，以免失之冗長瑣碎，或是見樹不見林的缺陷，而只就貫穿全書的兩項主軸思想來觀照巴特費爾德的核心歷史觀：一是人在歷史中的尊嚴與價值，二是神意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

(一) 人在歷史中的尊嚴與價值：

歷史是研究人類過去發展的一門學問，人理當是歷史事件的主角。十九世紀以來的實證史學為了強調科學證據的分析，往往重視社會、政治、經濟等顯而易見、可分析的歷史解釋因素，其結果是人類在歷史中的角色被貶抑或是被

²⁵ 巴特費爾德著，胡警雲譯，《基督教與歷史》，(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3 年)，作者為中文譯本序言，頁 1。

²⁶ William, A. Speck,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Legacy of a Christian Historian," *A Christian View of History?*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114。

淡化了。人類似乎是時空環境下的產物，科學化的分析似乎就是歷史解釋的全部。巴特費爾德對這樣的趨勢是大不以為然的，他認為人類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整個歷史的目的，個別的每一個人都在歷史中佔有其地位。歷史與自然是不同的，如果只是把人視為動物的一種，人類就成為自然人，習慣於以大集體、整個族群的方式被對待，個體的價值因此被忽視了。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就是建立在以種族發展為目的錯誤的基礎上²⁷，而排斥其他種族與個人。人類若是憑弱肉強食來衡量世界，就會把人的世界變得如蟻類的世界一樣。巴特費爾德也強調人是萬物之靈，獨具心思，「人類雖然從天真無邪中墮落了，……但是仍然具有上帝的形象，……每一個人都是珍寶、都是獨立的生命泉源、一首詩歌。」²⁸每一個人本身都有自己的目的，完美的人格是自然界最燦爛的冠冕²⁹，「歷史的目的就是塑造、教育人類的靈魂」³⁰。同樣的道理，「每一個世代都有永恆的價值，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存在。」³¹

巴特費爾德對歷史中的人與每一個世代的重視其實是源自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神愛世人，人是上帝珍貴的創造。聖經中處處充滿了上帝對受造者(人)的重視，例如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上帝的榮美；上帝差遣獨生愛子為人捨命、完成赦罪與救贖的恩典都表露了人的尊貴。以色列的君王大衛曾經感懷生而為人的「受造奇妙可畏」³²，又說：「人算什麼，你（上帝）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人）的腳下。」³³在認定人的尊貴身份的同時，巴特費爾德也沒有忽視聖經中對人性墮落後的教導。他承認人性中是有弱點的，特

²⁷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p.5-6.

²⁸ Butterfield, *The English man and His History*, p.133。轉引自 William, A.Speck,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Legacy of a Christian Historian," p.102。

²⁹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p.28。

³⁰ *Ibid.*, p.76.

³¹ *Ibid.*, p.67.

³² 〈詩篇〉第 139 篇第十四節，《聖經》，合和本，（香港：聖經公會），頁 761。

³³ 同前註，頁 662。

別是貪婪與自私。任何政治家、歷史家都不能假設人性中的自私心可以完全消除³⁴，而這也是造成歷史上許多罪惡的由來。許多罪惡的產生不是某些人特別壞的結果，而是多數人共同型塑而成的，我們不能將責任單獨歸咎於某些人。世事所以混亂是因為普遍存在人心的貪婪，世局日漸瘋狂是因為許多人的自大與自以為義。有些人的人性看來比較好，是因為他們很幸運沒有受到與別人相同的試煉³⁵。

人性的弱點既是無法消除，而又常常招來禍害，那麼對人性加以適度的約束以降低人性放縱的害處就成為必要了。政府、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建立正是為了彌補人性的不健全而設立的。如果沒有社會制裁，就算沒有犯下大罪行，只是偶爾忘記一些約束都會使我們失去優雅與寬容之心。所以社會制度、國家、政府、國際的均勢都有存在的必要，總比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好³⁶。由此可見，現代西方社會能保持一些美德與秩序是經由許多教育訓練、傳統思想所鍛鍊、並且經過許多世紀的累積耐心培育的結果。³⁷

有時這些被建立的秩序、制度也會崩解，對社會帶來衝擊。歷史上政權的衰敗、制度的崩潰、戰爭災難的毀滅常常被視為歷史對人類的審判(或是被視為天譴)，其中含有道德裁判的意味，例如拿破崙的失敗就被認為是權力過度驕矜而無節制所造成。那些沒有遭受災難、失敗的一方往往自以為義、沾沾自喜。事實上，我們不能說那些曾經遭受殘酷災禍的人一定比逃過劫數的人更壞³⁸，因為災禍的臨到可能是其他人為的過錯疏失所造成，一種制度文明的瓦解可能是其本身已經不適合當時的社會，或者是有人利用制度中的漏洞行惡造成制度需要淘汰。我們可以看見許多歷史上的審判，或是一個民族犯下罪惡而滅亡，「但不可以用這些情形來培養我們自以為義的心。」³⁹因為「如果人類夠好的話，那麼古代的城邦、中世紀的種種制度、以及近代的民族主義都不會敗

³⁴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p.35。

³⁵ *Ibid.*, pp.37-41。

³⁶ *Ibid.*, p.34。

³⁷ *Ibid.*, p.32。

³⁸ *Ibid.*, p.62。

³⁹ *Ibid.*, p.63。

壞。人文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應該都不會面臨破產。」⁴⁰ 在巴特費爾德看來，人性的弱點才是一切歷史災難的源頭，所以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的那些組織制度是否完善，更在乎屬於人類自身有價值的部份——就是培養良好的人格，「歷史是製造人格的工廠，甚至可說是把他放進石磨裏去；他不能給予我們所期盼不勞而獲的快樂，但歷史石磨的轉動使我們的人格成爲更精細的品質。」⁴¹ 看重此時此地的世代與生活，才可能避免悲劇。

(二) 神意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

巴特費爾德認爲我們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來看待歷史事件的發展：(1)出於人的作爲影響歷史事件的結果，(2)出於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客觀因素決定歷史事件的發展，(3)出於神意的安排。⁴² 因著人類的自由意志、創造力、與想像力，過去的歷史充滿了人類偉大、傑出而豐富的發明與作爲，就這種意義而言，人類是創造了歷史，特別是那些英雄人物的作爲對歷史產生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人類的社會、制度日趨複雜，人也受限於環境因素，有其無法自主扭轉或抗拒的事實，甚至產生災難和悲劇。歷史發展常被認爲是許多因素的集體意志交互作用產生的結果，但是其中仍然有一些是史家所不容易分析或解釋的。這個部份就是存在人類事物當中的神意(Providence)。巴特費爾德認爲「我們對於上帝所計畫的任何作爲不能有主動，我們也無法加以改變來符合我們的意願。」⁴³ 人類歷史故事就像演奏一首交響樂，每個人都認爲自己擔任最重要的部份，實際演奏時，我們只不過看到自己部份的樂譜，甚至連下一頁的音符也無法知道。除非全部演奏過一遍，我們無法知道總譜的全貌。上帝創作這首樂曲時，是隨著演奏旋律出現逐段逐節來修改曲調，但並不意味著作曲家留下許多空間讓演奏者隨興自由發揮。⁴⁴ 上帝又好像教導一個孩子在沙地上騎腳踏車，每當他路線騎歪時，不一定都要把他矯正帶回原來的路線，因爲主要

⁴⁰ Ibid., p.56.

⁴¹ Ibid., p.76.

⁴² Butterfield, "God in History," 收錄於 McIntire,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199.

⁴³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p.96.

⁴⁴ Ibid., pp.94-95.

目的是學會騎，至於路程方向是有相當的彈性變化。⁴⁵ 因此，巴特費爾德對歷史發展的基本觀點是上帝在歷史中有所計畫與安排，祂從起初創造宇宙萬物後就一直掌管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並沒有丟棄不管。上帝容許人類的自由意志參與其間，但並非放縱人們自以為是，任意妄為。進步也是神意的預定，但神意並不承諾無論人類怎樣做都一定會步步高升⁴⁶，有時人類也會違背上帝的公義，隨興而做，上帝就會停止他的干預與作為，其結果卻往往招來禍害。

人世的災難可能來自於人性的軟弱(例如驕傲、自私)，也可能出於神意的審判，那麼人類如何去避免歷世累代的災難呢?巴特費爾德對這問題也提出解決之道，並且懷抱樂觀的態度，其重點大致可歸納為三項：

1.在經歷大災難的悲劇後，人類會產生一種肯定而協調的心靈反省活動，痛定思痛，從經驗教訓之中獲得益處與進步，代表人類集體智慧的運行。就這項意義而言，災難雖然帶來痛苦，但也帶來省察、成長和進步，這是一種「從惡中創造出善來」⁴⁷。

2.人類若能自覺到神意的存在，知道自己並無權來創造歷史，只是順應神意而行，與神意合作，那麼我們和宇宙自然、其他族群的關係就會更和諧。如果人類驕傲自大，決意要將自己的理想加諸於現今的社會，或未來的世界，有時可以達成目的，有時反而帶來更大的傷害與毀滅。希特勒和許多其他歷史人物的作為可以證明這一點，俾斯麥就比其他政治家更重視神意，因為他知道「政治家不能創造時代的潮流，他只能航行於時代的潮流之上。」當人們敦促他趕快統一德國時，他的回答是「我們可以把時鐘撥快，但時間本身並不會因此而進行得快一點。」⁴⁸

3.上帝儘管會對人類的罪惡施行審判與懲罰，但其本意是出自極大的慈愛—亦即讓人類得到益處，並且上帝永不會背棄祂的承諾。舊約聖經當中猶太人的背離上帝、遭受奴役、亡國的歷史可以看到上帝仍然眷顧他們的民族，引

⁴⁵ Ibid., p.95.

⁴⁶ Ibid., p.97.

⁴⁷ Ibid., p.98.

⁴⁸ Ibid., p.100.

導他們到達應許之地、建國、得救贖。因此，巴特費爾德相信神意是上帝慈愛的彰顯，甚至「歷史上的災難不論有多大，……都能轉變成對人類極大的益處，神意能從惡中生出善來，甚至可以利用過去的罪惡來締造將來的美善。上帝的審判可能降臨在一個舊世界只是爲了替新的世界開路。」⁴⁹ 例如宗教戰爭培育了宗教信仰的寬容精神，美國獨立革命迫使英國改善殖民政策都是很好的例證。

總之，在《基督教與歷史》這本書中，巴特費爾德提示了歷史發展的主軸是上帝的計畫與人類的順應合作。上帝在歷史中有主導力量，但人類也並非完全任憑擺佈，仍然有其自由意志。上帝有審判，卻也有恩慈，人類有聰明才智、選擇的自由，但也有順服合作的責任。神和人都在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神學與史學也理當攜手合作，才能對歷史發展做完整的解釋。

伍、結語

十九世紀的實證史學流風所及，屬於個人主觀的宗教信仰在史學上幾乎無緣置喙，更遑論超越自然與科學理解的神意史觀了。「歷史科學之父」蘭克也是敬虔基督徒，但在其學術研究中卻少見基督信仰的痕跡。二十世紀的動亂局勢雖然刺激了精神文明重建的省思，多數史家仍不認爲神學與史學有交集的空間。巴特費爾德也曾經嚴格區分史學與他的信仰之間的關連，在1949年之後他卻成爲復興基督教史學傳統的領袖人物，不但結合了更多基督教歷史家的響應，並且從基督教的角度對當代文明危機提出獨特的分析與解決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巴特費爾德強調神意的存在，卻不直接以神意史觀來解釋歷史事件，也不是重回「教會式的解釋」的老舊史學傳統。在他的學術著作中，有關政治史的部份罕見神意史觀的出現，而在史學史與基督教的作品中才暢談信仰對歷史的重要性。他對當代文明重建的構思也許不能使各方面的人都滿意，但對基督教在西方歷史、文明上的貢獻卻提出了獨特的見解⁵⁰。或許要跨越存在於史

⁴⁹ Butterfield, "God in History", 收錄於 McIntire,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204。

⁵⁰ William, A. Speck,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Legacy of a Christian Historian," *A Christian View of History?*

學與神學、信仰與學術之間的鴻溝並不容易，以致於巴特費爾德來不及寫出結合史學與神學的經典作品吧！

陸、徵引書目

(一)英文部份

Butterfield, Herbert.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London: G.Bell and Sons LTD, 1954。

-----"God in History", C.T.McIntire ed.,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92-204.

Buttrick George, Arthur *Christ and History*,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63.

Harbison E.Harris,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Marsden, George and Roberts, Frank. *A Christian View of History?*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McIntire, C.T. *Go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Speck William, A.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Legacy of a Christian Historian," Marsden, George and Roberts Frank.ed., *A Christian View of History?* pp.99-118。

(二) 中文部份

王任光，《信仰與史學》，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

周樑楷，〈史學與宗教〉，收錄於《近代歐洲史家與史學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

-----，〈巴特費爾德史學思想之研究〉，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二年。

-----，〈基督教與近代西方史學的關係〉，《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八期，民國六十七年。

胡簪雲譯，《基督教與歷史》，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3。